

中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的冲击、 原因及启示*

◎ 王 信 孟郁聪 刘东岩

摘要：我国早已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走向目前的信用货币，虽然货币形态不同，但中国货币史对当今依然有重要启示。一是货币竞争自古而然，官定货币并不必然占据优势。二是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是维持官定货币地位的根本。三是科学有效的货币调控对保证经济社会稳定、维护官定货币地位至关重要。四是货币反假防伪依然是我国货币当局的重要任务。五是及时应对数字货币和相关支付工具给国内货币金融管理和国际货币竞争带来的挑战。应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加快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牢牢掌控货币发行权。

关键词：非官定货币 货币竞争 数字货币

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府很早就开始掌控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但历朝历代的币制多变、复杂、混乱，很多时候货币发行的集中统一性并不强，民间私铸货币、外来货币大行其道，官府对此试图打击而难以奏效。官定货币受到其他货币的严重冲击，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币制的复杂、混

* 作者王信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孟郁聪、刘东岩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乱反过来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进一步恶化政治经济形势，甚至成为王朝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梳理我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对官定货币的冲击和官府的应对，分析非官定货币经常出现的原因，并针对当前国内外的货币竞争总结几点启示。

一、中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的冲击及政府应对

（一）私铸、外来货币对官定货币的冲击

中国自古以来，货币因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王权的象征。官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但因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政府经济管理无能等原因，秦统一中国后两千多年间的很多时期，币制混乱，民间私铸、外来货币盛行。私铸者不但用其金属、设备、技术和人工，甚至自定钱币的重量、成色标准。在金属货币制下，只要非官定货币的金属重量、成色并不很差，就容易被接受而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秦灭六国后，统一全国币制，回收、销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铸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铸造权集于中央政府，同时禁止其他财物作为货币，官定“秦半两”得到广泛使用。然而在秦末战乱中，项梁部下私铸大钱，“秦半两”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刘邦为了打败项羽，允许民间私铸小钱，利用铜钱减重增加收入、扩充军备。这些私铸小钱轻薄如榆荚，史称“荚钱”^①。

汉朝建立后，朝廷在允许和禁止私铸之间摇摆，一些时期币制混乱、私铸猖獗的结果是“钱益多而轻”，物价飞涨^②。汉初，对铸币权是否应由朝廷掌握，就争论了百年之久。最初朝廷鼓励各地发展经济，听任郡国和民间自由铸币。随着商业资本崛起，新兴贵族和地方豪强实力增强，自由铸币的呼声更高。汉文帝时，盗铸钱令被取消，吴王刘濞凭借豫章郡铜山的有利条

① 石俊志. 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② 钱剑夫. 秦汉货币史稿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件，“召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其四铢钱流布全国；大夫邓通得赐蜀严道铜山，也自铸钱。各地私铸成风，铜钱由“秦半两”的7.8克左右减重至最小0.4克左右，且大小不一。汉景帝则实行削藩，收回铸币权。汉武帝时为远征匈奴、经略西域筹措经费，用银锡合金铸造白金币，实行通货贬值。由于未规定合金成色，含锡量可任意增减，导致“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当时郡国铸钱，民多盗铸，钱多轻薄。之后汉武帝改革币制，厉行高度的中央集中铸钱，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轻重适中，形制先进，是之后七百多年间中国的主要货币。

王莽篡汉时，靠推出种种新币、铸币大幅贬值来掠夺资源，满足大额开支需要。民众拒用新币，坚持用“五铢钱”，同时私铸蜂起。

从魏晋到隋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快，经济发展缓慢，时有通胀肆虐，因此币制不稳，私铸较多。两晋朝廷基本没有正式铸钱，主要使用两汉及三国旧钱。南朝时，宋、梁两朝财政开支大，税捐沉重，私铸盛行，后代所见的宋钱、梁钱多为私铸；萧齐时出现没有外郭的“五铢钱”，时称“公式女钱”，但官方铸造少，而由民间大量私铸。北朝东魏孝静帝时，洛州刺史王僧虔毁佛像私铸“五铢钱”，号称“河阳钱”。《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多为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官府不加禁止。这一现象应不仅限于北周^①。

唐朝时，私铸和外国货币也时有流通。唐初由于政权稳定、经济发展，货币需求明显增大。大历元年推行青苗税、地头钱，建中年间推行两税法，须用钱币缴纳税款，官定钱币更是供不应求，导致私铸兴起。由于铜材受到控制，私铸总量不是很大。唐玄宗时，官定货币信用良好、广泛流通，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元通宝”流通了两三百年，是“五铢钱”之后中国货币史上又一重要钱币。然而，“安史之乱”后，官定货币的地位由盛转衰，史思明在洛阳曾私铸“得一元宝”和“顺天元宝”。唐朝中后期藩镇各自为政，民间私铸重归泛滥。此外，唐代边疆地区还流通过外国货币。如近代

^①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在新疆出土大量波斯晚期银币，西突厥铸造的兼有突厥文和汉文的几种方孔钱也长期在中国境内流通。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准许民间自由铸钱，但民间铸钱不够分量，夹杂铅铁，后被禁止。

宋朝私铸钱币时有发生，当时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后，伪造纸币也出现了。宋朝币制较为复杂，官府认可铜钱、铁钱、纸币、白银混合流通。北宋前期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官定货币地位稳固。宋神宗时，官铸钱数量多、质量差，私铸钱开始增多。北宋末年，因财政捉襟见肘，蔡京主持推广“当十钱”，规定新铸大钱1枚可换旧小钱10枚，导致私铸泛滥、物价飞涨、商品交易停滞，北宋政治经济很快崩溃。

从南宋到明初两百多年间，朝廷在铸钱的同时推广纸币。南宋、金、元、明代都出现过因纸币滥发而引起通货膨胀，铜钱铸造成本大幅提高。结果纸币越发越多、铜钱越铸越少，民间私铸无利可图而基本停止。这一时期的纸币已采用特殊纸张、官押官印等防伪技术，民间伪造难度较大，但有关伪币的记载并不鲜见。如南宋淳熙年间，工匠蒋辉多次伪造纸币。元朝纸币刚问世，燕京等地就有人结伙伪造。元末纸币币值彻底崩溃，农民起义将领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均私铸铜钱。

明万历年后，连年战争，官府开支庞大，币制恶化，物价腾贵，私铸猖獗，甚至官府铸匠也干此营生。过去各朝铸钱，不惜工本，力求精整，以防私铸，但到了天启年，铸钱大幅减重，或降低铜的成色，加之官府铸局人员舞弊，异常轻小钱也投放市场，因而遭到抵制，据说苏州等地民众曾拒用天启钱达10个月之久。到明末，私钱名目繁多，对银的比价不断下跌^①。

清中后期，政治崩坏、国运日衰，清廷无力维持统一币制，外国银元、钞票竟成为中国主要流通货币。鸦片战争前，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加之利率较高，吸引外国银元持续流入。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中国内地，自广东、福建到黄河以南均有流通。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埠通商，外国银元流

^①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入更甚。早期最常见的“本洋”由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主要由广州等地外贸商人及菲律宾等地华侨带入。19世纪20年代开始铸行的墨西哥鹰洋，成色好且多年稳定，其受欢迎度超过之前的本洋，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成为标准货币，早期户部银行兑换券都以鹰洋兑现。当然，鹰洋只是各种外国银元的代表，据清政府调查，1910年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11亿元。

与外国银元相比，列强通过发行外国钞票能更低廉、便捷地掠夺中国财富。早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钞票已在我国出现，其流通大致限于闽粤等地。19世纪70年代后，先后有二十多家外资银行借口享有“治外法权”，不经清廷批准就在华发行纸币。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麦加利、汇丰、花旗等银行用中国货币单位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其在长江流域势力很大；二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发行纸钞，包括帝俄在东三省发的卢布票，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期在东北发的军用票，以及英商发行、在华南通行的港币^①。外资银行资本雄厚，加上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其钞票在当地形成了垄断。外资银行中，以俄资和日资银行的影响最为恶劣。据统计，1926年我国各公私团体、私人共存华俄道胜银行纸币12.6亿卢布，由于该银行破产，顷刻间这些资产化为乌有。日本则利用发行的纸币收购中国银元，运往大连销毁，旨在动摇中国金融体系。1917年至1920年，日本人收买的现银就有3000万元之巨^②。整体来看，清末货币结构中，外国银元占43.3%，外国钞票占12.4%，两者合计高达55.7%。列强配合政治经济入侵，在华发行货币，形成各自势力范围，其发行的银元和钞票成为列强控制旧中国的重要工具^③。

清朝除外国银元、钞票外，中国民间银号、钱庄和当铺等发行的银钱票对官定货币也造成冲击。如由于通胀，咸丰末年官票就被清理，但民间私票仍继续流通。这些私票以钱文或银两，而不是以银元为单位^④。

①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② 杜恂诚. 中国金融通史 第三卷 北洋政府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③ 千家驹, 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二) 官府对非官定货币的应对及其效果

是否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中国历史上多有争论、政策摇摆不定。有时官府允许私铸，以弥补当时流通货币之不足，但更多时候，出于防止非官定货币冲击官府铸币收益，或私铸多导致通胀，官府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击非官定货币，但效果不一定明显；有时因政局动荡、国力衰弱，对私铸和外来货币只好听之任之。

1. 通过严刑峻法进行打击

相关例子比比皆是。汉景帝时，为打击盗铸颁行“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王莽时期，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因私铸而定罪者不可胜数，甚至有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刑罚不可谓不严，但私铸铜钱未能禁止。汉武帝铸造“五铢钱”当年，就有“真工大奸盗为之”；官铸“白金三品”面世之后五年，因私铸者过多，法不责众，死罪获赦免者数十万人。纸币出现后，因官定纸币容易滥发、信用难维持，官府对金属币的流通、纸币造假等打击力度普遍较大。元朝1297—1300年，杭州等地破获印造伪钞案88起，囚禁关押涉案人员274人。当时官府对伪造纸币刑罚极重。元后期伪钞案中，“凡起意者、雕板者、印钞者、抄纸者、项科号者、蒙里安藏印造者、收买颜色物料者”，一律处斩。但由于官印纸币质量下降，不同面额纸币防伪差异较小，民间挑补描改，用小钞伪做大钞，假钞难以杜绝。

宋朝规定私造交子者要被发配，伪造小钞且进入流通者处斩。但由于伪造纸钞需要一定财力和技术，伪造者多与社会上层联系密切，“一有败露，纳贿求免”^①。如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告发匠人蒋辉伪造会子2600余张，宰相王淮有意包庇，蒋辉等人提前得到消息试图逃跑，被抓回后又“尽行释放”。

2. 官府积极收兑

唐初，朝廷多方收兑不规范、不足值的“恶钱”，对减少私铸钱币流通起

^① 汪圣铎. 两宋货币史（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到了积极作用。唐高宗时，官方按1：5用官铸好钱收兑不足值“恶钱”，但因“恶钱”尚有相当含铜量、收兑比例过低而被藏匿。官府改按1：2收兑，又试图用陈年粮食收兑。尽管流通的“恶钱”减少，但仍有人在江中舟筏上私铸钱。开元年间，朝廷强令收集熔化“恶钱”改铸好钱，有效打击了私铸铜钱流通，但铜钱流通减少，引起市场骚乱。

清乾隆年间为打击民间私铸，也曾实行官方收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西以1枚官铸铜钱换5枚私铸铜钱，但违法者在换到大钱后又“私行销毁，复铸小钱”；有官员徇私，将收到的小钱“复行转售，弊中生弊”^①。仅仅一年之后，收兑私铸铜钱就不了了之。宣统年间，清廷曾企图统一混乱的货币发行制度，如1910年规定大清银行统一发行钞票，各省商号发行的私票逐步收回，但政策未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1935年民国政府发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银元收兑并不彻底。法币贬值时，未收兑的银元又重新进入流通，促使法币加速贬值、信誉崩溃^②。

3. 控制制币材料

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币材之一。中国铜矿较少，官府控制铜材、铜器的私藏和交易，有利于防止私铸。西汉时，贾谊强烈反对私铸，提出了“铜国有”的主张。王莽篡汉时，禁止民众携带铜、炭，以防私铸。唐代官府管制铜矿石、铜器交易，控制铜锡买卖。唐玄宗时，官府规定私人开采冶炼的铜一律由官方收购。五代后周的世宗实行黄铜国有政策，禁止民众藏铜。宋代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禁止私人采炼、占有原铜，经批准铜矿的产品须由官方全部收购^③。南宋时明确把铜列为官方专营。由于对铜控制较好，唐宋两代官铸铜钱数量多、成本低，私铸铜钱较少，对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① 叶世昌. 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卷 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③ 汪圣铎. 两宋货币史 (修订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宋、元时期，官府通过控制印钞纸张来防伪。宋朝官府选定楮皮制造的“川纸”作为印钞专用纸，并加强管理、保证钞纸供应。元朝官府用桑穰制造印钞纸，民间很难伪造。但宋、元后期，钞纸质量均下滑；元代时甚至改用榆皮来制造印钞纸，质量很差。因此，宋、元后期伪造的纸币大量流通，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4. 允许实物货币流通使用

中国历史上，面对官府恶钱泛滥、私铸猖獗、通胀严重的困境，有时官府会限制金属铸币的流通，推动或认可谷帛等实物货币的广泛使用。这一方面可打击金属币私铸；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减少铸币流通数量，可抑制高通胀^①。西汉元帝时，因汉武帝之后日益泛滥的私铸问题，官府减少铸钱，谷帛的货币地位提高，贡禹等大臣甚至主张租税只用谷帛缴纳。王莽新朝末年（公元24年）因私铸钱太多、币制混乱，官府停止铸钱，完全用谷帛作为货币。东晋桓温执政（公元347年）后，因地方豪族私铸铜钱，朝廷允许将布帛切成不同大小来使用，大大提升了布帛的支付功能。东晋桓玄攻下建康、把持朝政后（公元402年），也允许实物货币流通，甚至主张正式废钱币用谷帛，但因大臣反对而作罢^②。

然而，实物货币毕竟使用不便，且民间可通过浸湿谷物、摊薄绢布来牟利，实物货币只在特殊时期暂时流通，难以持久，更无法作为主要的流通手段。

除上述措施外，官府还用其他手段应对非官定货币的冲击。例如，清末朝廷通过印花税来限制民间钱庄、票号等发行的私票。

应该指出，在政局动荡、国力衰微时，币制往往较为混乱，官府无暇、无力对非官定货币进行严格限制和打击，这也是非官定货币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下文将进一步说明。

^① 钱穆. 中国经济史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② Gruen, Sarah.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Mimeo, 2004.

二、中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兴起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一些时期，民间私铸和外来货币大行其道，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一）官定货币供应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在金属货币情况下，由于政府缺乏对货币需求的有效掌握和应对、制钱材料有限等原因，货币投放未能及时增加，成为非官定货币兴起的诱因。

初唐到开元年间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当时天下太平，人口增多，商业发展，货币供应却迟迟未跟上。武德四年废旧钱，货币流通全靠新铸之开元通宝，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以致实物经济盛行，官府鼓励商民兼用绫、罗、绢、布等作为货币，但这些实物使用有诸多不便。有识者对官府未能多采矿铸钱深以为弊，^①如张九龄反对实物货币，主张民间自由铸钱，否则货币量太少将影响生产。

唐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两税法，规定各种租赋全用铜钱缴纳。这有利于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新铸钱少，大量钱币作为税款流入国库不再放出，富人因钱贵争相窖藏，流通中的铜钱更为不足。白居易因此赋诗“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税负更为沉重。为增加铜钱供应，唐德宗贞元9年（793年）朝廷奖励采铜，规定开采的铜全由政府收买铸钱、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和蓄积铜钱，但还是难以满足钱币流通的需求。由于铜山往往被地方豪强占据，奖励采铜的措施实行30余年后，采铜量仍很有限，导致官铸铜钱不足、私铸泛滥。据彭信威（2015）估计，唐朝开元至天宝年间货币总量在4260万贯左右，人均摊得720文，其中近一半是民间私铸币。大量私铸并未引起高通胀，而当官府查收

^① 陈子昂在《上益国事》中指出：“伏见剑南诸山，多有铜矿，采之铸钱，可以富国。今诸山皆闭，官无采铜，军国资用，唯敛下人。乃使公府虚竭，私室贫弊，而天地珍藏委弃不论。”

恶钱，商民反而觉得不便，可见货币需求之大。

（二）滥发货币，官定货币信誉扫地

历史上官府为应对连年战事和巨额国内开支，往往通过铸币减重或滥发纸币大肆搜刮财富，造成高通胀，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官定货币的信心，这是私铸产生和屡禁不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反对中央集中铸币、鼓吹民间自由铸造，重要理由之一正是官府朝令夕改，官钱日益薄轻，通货贬值司空见惯。如果私铸金属币的重量、成色不输官铸币，或民间纸钞的金属发行准备不是很差，民间发行的币（钞）就可通行。

据考证，从汉代到辛亥革命以前，历代最为严重的通胀计15次。恶性通胀时期，私铸猖獗。例如，南朝刘宋孝武帝至废帝铸孝建四铢，减重40%，官民竞铸恶钱。萧梁朝在侯景之乱时，国库空虚，不得不铸行铁钱，商人以车载钱，私铸司空见惯。宋朝官铸钱的成色有逐年减低趋势。宋钱以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铸造的太平通宝为最好，含铜65.58%，以后各朝铸钱含铜比例逐渐降低。徽宗时的夹锡钱含铜57.14%，却规定当两个铜钱用，实际含铜量减少了一半多^①。

与金属货币减重相比，纸币滥发更易导致通胀，对公众信心影响更大。元朝时纸钞发行过多，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使客饮食之费，几十余倍于前”。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宝钞一贯（面值铜钱1000文）在两浙仅值铜钱250文，四年后则仅能兑换160文。这使得人们丧失对纸币的信任，私下以银两交易。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宝钞一贯只能兑铜钱1~10文。明初由于纸币信誉扫地被淘汰，中国相当部分经济重新回到自给自足、以物易物；货币发行流通出现“真空”，是17~19世纪西班牙、日本等国银币进入中国并普遍流通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到了近现代，北洋政府滥发纸币为巨额财政

^① 千家驹，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② Ma, Debin. 2012, Money and Monetary System in China in the 19th–20th Century: An Overvie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 159/12.

赤字融资，导致货币发行声誉大跌，外国银行、国内私营银行、私人商户、钱庄票号纷纷巧立名目发行纸币^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国统区纸币信用崩溃，各项交易大量使用黄金、美钞。

（三）币制长期不统一，称量货币使用不便

我国历史上，有关应否由官府统一铸币制钞多有争论、经常反复。即使在官府铸币的情况下，由于中国中央集权、地域辽阔，形成“中央管不了、地方不能管”的局面，官定货币的铸造发行管理也较为乏力、松散，货币形制、规格、重量、金属成色五花八门。金银货币长期称量使用，在币制混乱时期，铜钱差异过大，也需称量。货币称量使用固然可以减少欺诈、保护交易者的利益，但毕竟有诸多不便，为非官定币的流通大开方便之门。

战国时，钱币多由地方铸造。秦汉时中央集权，法律上政府统一铸钱，但制度流于表面。例如，秦半两枚枚不同，至今未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矩，一望可知为官炉所铸的秦半两^②。官炉所铸铜币铸造工艺简单粗糙，数百年间没有进步。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价值较低的铜钱不需精细打造。即使到了清代，清政府铸造铜钱主要通过北京的宝泉局、宝源局，这二局也有“局私”，公然以降低铜钱成色重量来牟利^③。

在明代，白银普遍作为货币使用之后，其标准也不统一，成色各异。到清代，政府从不铸造银锭，除清末出现官铸银元外，并无官定白银形式，而是由各州、县衙或其他机构在税收时期招来银匠，设立临时性官炉房。官银匠在收银时，往往苛估成色，横加勒索，民众怨声四起，因而贸易和市面流通用银，主要由私炉铸造^④。即使到清光绪后，各省银元局也几乎都是独立的，银币流通具有地方性。

①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②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③ 刘克祥, 陈争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④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1980—1935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作为称量货币，金银在用于交易时，要先称重、再折算。早年来华的传教士看到中国人做生意都带一杆秤。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十分复杂，晚清时有库平、关平、漕平、市平等大类，分别适用于政府税收、海关税收、漕粮折色和市场交易；每一大类还有若干小类，各地标准总计超过1000种^①。我国集中发行、重量规格规范统一的金银铸币很晚才出现。两晋南北朝开始出现有一定规格、形体、可计数使用的金银币，但主要在统治阶层内部作赏赐、馈赠、祭祀、布施等用，不进入市场流通。相比之下，标准的金银铸币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②

19世纪初以后，大量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都计枚核值、流通，远比中国银两方便。“既不必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须称分量之轻重，远行服贾，便于携带”^③。由于民间乐用，其作价高于实价，外国银元“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许多人用银元换取含银量更高的银两套利^④，甚至出现中国银锭纷纷流出境外，改铸为外国银元再进入中国流通的现象^⑤。

20世纪以后，保证货币统一发行的一些重要制度才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强化了官定货币的地位。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才开始筹设政府银行发钞，当时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居然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制。民国北洋政府颁布条例，对货币单位、面额、材质、重量等做了具体规定。成立币制局，对货币的铸造、发行等进行监督管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设立中央银行等机构控制金融业，于1933年“废两改元”，废弃称重使用的银两而改用国际先进的银元制度，银币铸造专属中央造币厂，其他旧有局厂一律停

①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1980—1935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② 例如，公元前546年，居流士的波斯帝国攻灭吕底亚，之后统一西亚、中亚，在这些区域推行统一的金银币，对经济金融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③ 张国辉. 中国金融通史 第二卷 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④ 魏建猷. 中国近代货币史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

⑤ Irigoin, Alejandra. 2009. The End of a Silver Era: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Spanish Peso Standard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s–1850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2 : 215–20.

废，旧银元在一定期限内停止使用^①。之后，利用银两流通牟利的钱庄和外国银行势力急剧下降，官定货币的地位得到了加强^②。

（四）政治腐败、崩坏，官府无法维持官定货币地位

官定货币的有序流通、使用，需要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有力手段加以保证。在政治崩坏、社会动荡时，政府管控经济的能力势必急剧下降，甚至滥发纸币、铸行恶钱。由前文可知，无论是通胀或通缩，都可能导致非官定货币的兴起。同时，如果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分崩离析，诸侯割据、地方分裂愈演愈烈，非官定货币就难以得到有效打击，将对官定货币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取而代之。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被列强欺压，无力维护货币发行权，这使得外国银元、银行券大行其道。同治、光绪年间，列强按其在中国势力范围划定银元的金融势力圈。如英国专门铸造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站洋”、香港银元，在平津及华东、华南地区流通；美国贸易银元专供远东贸易，挤占“站洋”地位；法国安南银元垄断云南、广西两省；日本龙洋大量流入东三省和福建等地^③。各地俨然成为金融的独立王国，清政府货币发行权被列强彻底瓜分。

在清朝地方政府模仿外国银元纷纷自铸银元（即“龙洋”）后，清廷放任外国银元继续流通。清政府对外商银行在华发行流通的外钞既不取缔，也未进行检查管理，有关外钞发行量、发行准备等事项，完全不过问；对有关中国也设立银行发钞的主张，清廷多年后才许可^④。总之，货币发行权的丧失，使中国经济进一步陷入混乱，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① 洪葭管. 中央银行史料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② 陆仰渊, 方庆秋. 民国社会经济史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③ 千家驹, 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④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三、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历史上币制长期未统一,即使在中央集权时,统一、规范的货币发行和管理也较为罕见。历朝历代货币竞争一直存在,私铸、外来货币对官定货币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尽管官府对非官定货币采取严厉打击、积极收兑、控制铜等制币材料、允许谷帛等实物货币广泛流通等手段,但应对效果不一定理想。

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的动荡、混乱,影响币制稳定,容易导致非官定货币泛滥。这主要表现在:政府未能及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扩大货币供应,经济陷入通缩,非官定货币有市场需求的基础;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官定货币的价值、信誉一落千丈;统一、强有力的货币发行管理制度和机构缺乏,官定货币的形制、规格、重量、成色等纷繁杂乱,使用不便;国力疲弱,政府腐败无能,放任私铸和外来货币横行,等等。

中国货币史上的货币竞争对当今我国的货币管理有着重要启示。

第一,货币竞争自古而然,官定货币并不必然总是占据优势。古今中外,曾发挥支付工具、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等货币职能的物品林林总总,各种货币的竞争一直存在。从世界各国历史看,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纸币,从民间分散发行到政府集中统一发行是普遍规律。正常情况下,这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货币的关键特征是可接受性和稳定性,政府似乎可凭借其政权的强制力而保证官定货币的地位,但历史上官定货币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私铸币、外来币取代的例子比比皆是。政府必须牢牢掌控货币发行权,但这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具备坚实的基础。

第二,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是维持官定货币地位的根本。金属货币制下,官定、非官定货币本身皆有价值,货币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本身价值、使用便利程度的竞争。但在信用货币制下,官定货币仅仅是一种价值符号,其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人们普遍认同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和价值保证的国家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既包括经济金融实力,也包括政治、军事等

实力。如果出现政治崩坏、社会经济动荡、金融危机等状况，一国官定货币就可能迅速被抛弃。即使在今天，也不乏津巴布韦等危机国家出现以物易物、使用实物货币、货币美元化等事例。

第三，科学有效的货币调控对保证经济社会稳定、维护官定货币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外历史上，官定货币总量过多或过少，通胀、通缩较为严重时期，都容易导致非官定货币的兴起。到今天，货币调控已成为一门高度复杂的科学，以实现货币供求基本平衡，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这是保证官定货币地位、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前提。科学有效的货币调控需要一系列制度机制保证，如调控目标和货币当局的定位、调控手段的赋予等，都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合理调整。

第四，货币反假防伪依然是一国当局的重要任务。历史上，我国金属铸币形制、规格等五花八门，非常复杂，难以准确辨识，为私铸币的流通打开方便之门。在现代信用货币情况下，法定钞票很容易做到统一、规范，但部分假币乱真度高，国内、跨境假币犯罪不能禁绝，在一些地区、人群中造成危害，甚至对一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较大冲击。政府可以通过强化防伪技术、发行新版钞票来防范，但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货币质量提升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可能需较长时间。因此，应高度重视货币反假防伪工作，站在假币犯罪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高度来看待，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各部门合力对假币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及时收缴、销毁假币。借鉴历史经验，对印钞造币和防伪所用纸张、金属等各种材料，以及全部或部分盗用法定货币图案等行为加以严格管控。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各券别的提升，提高印钞造币材料的可靠性、独一性，强化防伪特征，使人民币难于伪造、易于识别。

第五，数字货币和相关支付工具的出现，给国内货币管理和国际货币竞争带来新的课题和挑战。随着科技驱动的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的发展，各种形式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和相关支付工具，甚至包括代币、积分等层出不穷，有些“类货币”使用便捷，在一定范围发挥了货币的部分职能，大大改变了支付格局，对现金使用、商业银行业务都造成较大冲击。现金使用减少

有利于降低相关的社会成本，但如果上述具有民间信用的电子支付、数字货币等无序发展，削弱央行的货币发行权，造成严重的金融脱媒，就可能危及经济金融稳定。恩格斯说，最重要的商品即货币恰最需要垄断。因此，应密切关注、全面评估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发展及其影响，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打击；同时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及相关电子支付工具的研发，牢牢掌控货币发行权。鉴于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各类虚拟货币、数字货币容易突破国界和传统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可能改变当前国际货币竞争态势和格局，加大货币管理、反洗钱等工作的难度，我国也应及早加以应对，争取主动。

参考文献

- [1] 戴建兵.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980—1935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杜恂诚. 中国金融通史 第三卷 北洋政府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 [3]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 [4] 洪葭管. 中央银行史料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 [5] 刘克祥, 陈争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6] 陆仰渊, 方庆秋. 民国社会经济史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 [7]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8] 钱剑夫. 秦汉货币史稿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9] 千家驹, 郭彦岗. 中国货币演变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10] 钱穆. 中国经济史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 [11] 石俊志. 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 [12] 魏建猷. 中国近代货币史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5.
- [13] 汪圣铎. 两宋货币史 (修订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14] 叶世昌. 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卷 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 [15] 张国辉. 中国金融通史 第二卷 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 [1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上海钱庄史料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 [17]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18] Gruen, Sarah.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Mimeo, 2004.
- [19] Irigoin, Alejandra. The End of a Silver Era: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Spanish Peso Standard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s–1850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2 : 215–20, 2009.
- [20] Ma, Debin. Money and Monetary System in China in the 19th–20th Century: An Overvie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No. 159/12, 2012.

Impacts,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Non-fiat Currencies in Chinese History

WANG Xin

MENG Yucong

LIU Dongyan

(People's Bank of China)

Abstract: China moved from the use of physical currency and metal currency to the use of credit currency a long time ag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rrencie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oday, despit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urrency. First, currency competition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fiat currency has not necessarily he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Second,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sound economic growth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of fiat currency. Third, effective currency control is critical to ensur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of official currency. Fourth, anti-counterfeit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Fifth, the authorities should respond timely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currencies and related payment tools to domestic monetary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competi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fully mobilized to speed up the R&D of digital currencies by the central bank, and to ensure firm control over the currency issuing power.

Keywords: Non-fiat Currency, Currency Competition, Digital Currency